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章德宾,何增华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正向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建议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增进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信任;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关键词 土地经营规模;信任;合作绩效;调节效应;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 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2-0109-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2.001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是当前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应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有效途径。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农业人口较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与风险、提高农业收入,还有助于满足农村地区社会及文化需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是合作绩效。合作社只有提供良好的服务、拥有较好盈利能力才可以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以及合作社的持续发展。而信任作为合作行为产生的基础,在合作经济中,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高信任度有助于提升合作效率、降低合作成本,从而促进合作的发展。

农户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可受到外在因素调节,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要素,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其合作、生产等行为及意愿必然存在差异。随着土地规模经济的发展,农业将呈现分工机制^[1],农户行为因不同土地经营规模而存在差异^[2]。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技术以及所承担的风险都相应增大,出于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态度会更积极主动^[3]。同时,因经营规模差异引起的非农收入比重变化,也可使农户加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愿强弱不同^[4]。

土地经营规模是否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存在调节效应?若存在,其具体调节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和构建了此调节作用逻辑模型,设计问卷并对武陵山区与江汉平原腹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进行调查,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然后将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选择偏好等外在属性作为依据对农户进行划分,进一步分析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

1.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信任对合作关系的生成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Arrow 指出信任对于经济合作行为具有重要

收稿日期:2016-08-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鲜蔬菜供应链农户与经销商合作行为研究:结构、前置因素及对成员绩效的影响”(713730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优化研究”(71373063)。

作者简介:章德宾(1975-),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流通、合作行为。

促进作用,并强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任缺失^[5]。Campo 等提出信任可来源于已有合作历史经验和合作伙伴的声誉,而且信任是促进合作成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6]。刘宇翔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自发的合作主要基于成员间的信任而产生。他将合作社成员的合作行为总结为“信任—合作—加深信任—继续合作”,并认为除了较为薄弱的“关系信任”,维持这种关系还需要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信任^[7]。也有学者从博弈论^[8]以及社会网^[9]等不同视角论述了信任对于合作凝聚力增强有着突出的作用并提出信任是合作社持久发展的保证等观点。

(2)信任有利于降低合作交易成本等从而增加合作绩效。Hansen 等从认知与情感两个维度研究了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认为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对增强农民合作关系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社员分布不集中时,社员的信任对于合作社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影响^[10]。黄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信任是合作发生以及发展的必要条件。信任是对某种风险承担的鼓励,信任的存在,可使合作契约简化,从而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绩效^[11]。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合作社社员的信任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员的参与行为以及合作绩效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2]。

2. 土地经营规模在农户信任与合作绩效关系中起调节效应

(1)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作用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Hansen 指出信任对合作的影响作用可取决于成员的需求,而且成员的地理分布也会影响信任的作用^[10]。廖媛红认为农户信任作为重要的个体社会资本是合作的关键因素,但其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受到个体与合作社利益一致程度的调节^[13]。赵泉民等也认为虽然信任是合作经济行为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中国乡村社会中信任及信任结构存在其特殊性,合作社是“情+利”的产物,只有农户信任与合作者获利目的的利益诉求相辅相成,才能更好促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14]。其他调查还发现,合作社社员信任对合作社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受到合作社治理特征影响,此外,入社年限等社员特征和合作社组织结构也对此作用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15]。

(2)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合作行为存在明显影响。罗必良认为,随着土地规模经济的发展,农业将呈现分工机制^[1],不同土地经营规模下,农户行为表现差异性会更大。郭红东等认为经营规模差异是重要经营特征,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对于合同农业有着不同的选择意愿,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其他农业经营行为(如参与订单农业)的重要影响因素^[16]。Key 等对美国养殖业农户调查后发现,农户经营规模越大,就越能获得更多融资,减少风险,越能发挥规模效用,其参与订单合作可能性也就越大^[17]。Juliu 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指出农民合作意愿不强,与其土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有重要关系^[18]。卢向虎等通过多省市实证调查后指出,因经营规模较大,农户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技术以及所承担的风险都相应增大,出于避险需要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大^[19]。张笑寒认为家庭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土地入股决策行为的因素之一,耕地面积不同的农户对合作的意愿不同^[20];在农产品市场中,孙亚范认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所经营产品的市场风险越大,出于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态度会更积极主动^[3]。

通过分析可知,农户信任水平高低对于合作关系的最终绩效存在影响,信任水平高则合作成效显著,但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受到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逻辑模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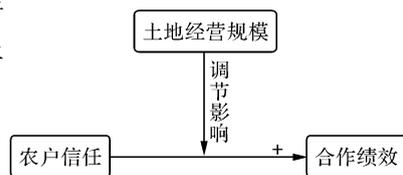


图 1 逻辑模型

二、变量设置、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 变量设置

(1)自变量:农户信任。农户的一般信任即直接信任,主要是指农户未加经验判断的主观信任程度。徐旭初等对合作社信任关系测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任者对被信者的主观信任程度,同时指出声誉也是影响因素之一^[21]。孙艳华认为合作社承诺的兑现也可作为合作组织信任关系测量的重要维度^[22]。因此合作社与经销商对于契约的履行状况也是信任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黄珺在研究农户信任与合作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将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11]。情感信任即指一般信任,而认知信任是理性经验判断的结果,也可称之为计算信任。因此,本文对农户信任的测量选

用农户的一般信任、对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合作社契约履行以及认知信任 4 个指标。

(2)因变量:合作绩效。已有文献对合作绩效测量指标做过较多研究,徐旭初建立了包含 16 项指标的农民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合作社自查自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社员对合作社治理满意度等几大类^[23]。赵佳荣建立的绩效体系除经济绩效外,还添加了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其中社会绩效重点指对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贡献,包括了合作社解决农产品生产销售困难等^[24]。此外,还有学者从行为与产出两个方面构建合作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分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以及管理绩效等^[25]。合作绩效中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最为重要,结合调查实际,本文使用收入增加、合作满意以及服务质量三个具体指标来测量合作绩效。

(3)调节变量:土地经营规模。待调查地区大部分农户其土地主要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结构也比较单一。通过预调查获知该村庄农户耕地面积,便于研究采用定序的方法测量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将土地面积 0~5 亩设定为 1,6~10 亩设定为 2,11~15 亩设定为 3,16~20 亩设定为 4,20 亩以上设定为 5。

(4)属性特征: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偏好。农民收入水平作为重要家庭特征^[16],直接影响农户的行为选择。农村经过税费改革后,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民外在经济压力依然严重,并影响农户行为^[26]。在农村,外出务工仍然是一种增收的有效途径,农民兼业化与农业副业化是农业经营格局的重大变化趋势^[27],收入渠道的多少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此外,风险偏好也会导致农户的行为差异^[28]。本文加入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偏好等经济属性特征作为农户分组的依据。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 1。

表 1 变量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描述	变量赋值
自变量	一般信任	对经销商的主观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非常信任=5
	声誉评价	对合作社与经销商声誉的评价	非常不好=1;非常好=5
	契约履行	经销商不遵守合约的行为	经常有=1;完全没有=5
	认知信任	理性经验判后的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非常信任=5
因变量	合作满意	对合作社的整体满意程度	非常不满意=1;非常满意=5
	收入增加	加入合作社后收入是否有增加	完全没有=1;非常明显=5
	提供服务	遇到困难合作社帮助解决情况	非常不好=1;非常好=5
调节变量	土地经营规模	农户家庭耕地面积	0~5 亩=1;6~10 亩=2;11~15 亩=3; 16~20 亩=4;20 亩以上=5
属性特征	收入水平	在全村中大致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高=1;收入水平低=2
	外在压力	所受外在经济压力大小	外在压力大=1;外在压力小=2
	收入渠道	除农业收入外的其他收入渠道	渠道较多=1;渠道较少=2
	风险偏好	收益与风险偏好类型	风险喜好=1;风险厌恶=2

注:变量赋值除属性特征外均采用里克特 5 级量表。限于篇幅,除土地经营规模外,其余变量在表中仅列出选项 1 与选项 5。

2. 实证模型

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类型的不同,调节效应的验证方法可分为变量间交互效应方差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两类。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则将调节变量作为第二层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29],当加入调节变量后的判定系数有显著改变,则调节效应存在。计量模型为:不考虑调节效应时:

$$Y = aX + bM + e \tag{1}$$

考虑调节效应时:

$$\begin{aligned} Y &= aX + bM + cXM + e \\ &= (a + cM)X + bM + e \end{aligned} \tag{2}$$

式(1)、式(2)中,X 为农户信任,Y 为合作绩效,M 为土地经营规模,e 为随机扰动项,a, b, c 为回归系数, a + cM 为考虑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具体检验方式:检验 Y 对 XM 的偏回归是否显著,即直接对模型(2)检验假设 c ≠ 0 是

否成立;对比模型(1)(2)中回归的判定系数 R^2 (即拟合优度系数),若判定模型(2)的回归效果比模型(1)好,则表明 c 的引入更好地解释了因变量变化,证明调节效应存在。

3.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是武陵山区与江汉平原腹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两地分别代表了欠发达农村地区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在进行正式问卷调查之前,已通过村民讨论和预先模拟调查,划分了主要调查片区并制定进度计划,调查进行中,对每份问卷逐一进行实时检查,保证了调查的合理有效。武陵山区中的合作社回收问卷 108 份,剔除无效问卷 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4%;江汉平原腹地的合作社回收问卷 1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样本特征分布

特征	性别		年龄			家庭人数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20~40	40~60	60 以上	4 以下	5~6	6 以上	小学	初中	高中
样本量	152	42	41	135	18	77	95	22	130	53	11
占比/%	78.4	21.6	21.1	69.6	9.3	39.7	49.0	11.3	67.0	27.3	5.7

三、实证分析

1.农户信任对合作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

本文数据分析工具为 SPSS 19.0。为避免变量间具有多重共线性,首先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对自变量信任和因变量合作绩效中 7 个条目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系数分析,Cronbach's α 为 0.737,KMO 值为 0.708,都在 0.7 以上,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统计量为 523.522,伴随概率 Sig. 值为 0.000 小于 0.05,表明变量的信度与效度都较好。表 3 给出了自变量、因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 3 变量的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一般信任	声誉评价	契约履行	认知信任	收入增加	合作满意	服务质量	经营规模
一般信任	3.175	1.106	1.000							
声誉评价	3.051	0.868	0.422**	1.000						
契约履行	2.755	1.174	0.055	0.146*	1.000					
认知信任	3.052	1.231	-0.111	-0.057	0.128	1.000				
收入增加	2.948	1.286	0.149*	0.249**	0.444**	0.381**	1.000			
合作满意	2.845	1.258	0.057	0.188**	0.345**	0.367**	0.560**	1.000		
服务质量	2.603	1.276	0.182*	0.327**	0.478**	0.273**	0.652**	0.781**	1.000	
经营规模	2.690	1.282	0.027	0.075	-0.073	-0.016	0.255**	0.404**	0.365**	1.000

注: *、**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显著。

将自变量农户的一般信任、合作社的声誉评价、合作社契约履行以及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收入增加			合作满意			服务质量		
	β	S.E.	F	β	S.E.	F	β	S.E.	F
一般信任	0.113	0.075		0.014	0.079		0.088	0.075	
声誉评价	0.242	0.097		0.209	0.102		0.365***	0.096	
契约履行	0.402***	0.066		0.297***	0.069		0.442***	0.065	
认知信任	0.367***	0.062	25.272***	0.345***	0.065	15.337***	0.252***	0.062	25.667***

注: *** 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 4 可知:(1)农户一般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2)农户对合作社与经销商的声誉评价对服务质量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对收入增加、合作满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3)合作社契约履行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4)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2. 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验证

探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 实质是比较加入调节变量后的模型间系数差异, 此类问题通常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 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变量	收入增加			合作满意			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	
	β	R^2	F	β	R^2	F	β	R^2	F	容忍度	方差膨胀系数
一般信任	0.168*			0.054			0.200*			0.998	1.002
规模	0.241*	0.085		0.390***	0.165		0.355***	0.162		0.991	1.009
一般信任×规模	0.092	0.096	6.684***	0.046	0.168	12.785***	0.032	0.164	12.398***	0.991	1.009
声誉评价	0.356***			0.239*			0.445***			0.984	1.016
规模	0.236***	0.118		0.384***	0.188		0.340***	0.223		0.994	1.006
声誉评价×规模	0.117	0.127	9.148***	0.080	0.192	15.067***	0.015	0.223	18.277***	0.990	1.011
契约履行	0.508***			0.401***			0.553***			0.995	1.005
规模	0.275***	0.277		0.412***	0.304		0.398***	0.394		0.991	1.009
契约履行×规模	0.099	0.292	25.718***	0.082	0.314	28.715***	0.109*	0.412	43.915***	0.996	1.004
认知信任	0.399***			0.375***			0.287***			1.000	1.000
规模	0.268***	0.211		0.411***	0.302		0.385***	0.216		0.993	1.007
认知信任×规模	0.120*	0.234	19.070**	0.137***	0.333	31.284***	0.109*	0.235	19.224***	0.993	1.007

注: *、**、*** 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 5 可知。(1)土地经营规模对一般信任—收入增加、一般信任—合作满意、一般信任—服务质量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但不具有显著性。(2)土地经营规模对声誉评价—收入增加、声誉评价—合作满意、声誉评价—服务质量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但不具有显著性。综上可认为: 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3)土地经营规模对契约履行—服务质量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时, 合作社契约履行越好越能促进农户合作的服务质量。也可认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 在其合作的服务质量的形成中, 合作社契约履行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服务质量仅是合作绩效的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土地经营规模对契约履行—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仅得到部分验证。也说明合作社契约履行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必然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4)在收入增加、合作满意、服务质量 3 个绩效指标上, 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认知信任—合作满意、认知信任—服务质量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可见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

3. 农户分组后进一步验证

通过经济属性特征作为依据对样本进行分组, 可进一步验证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具体调节机制。土地经营规模对一般信任、声誉评价以及契约履行—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并未得到完整的验证支持, 因此不必做进一步分析。而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效已得到验证, 即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激励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因此, 针对认知信任, 以收入水平, 外在压力, 收入渠道, 风险偏好等经济属性特征作为分组依据, 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做更深入探究, 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土地经营规模对不同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调节效应

属性特征		收入增加			合作满意			服务质量		
		β	R^2_1	R^2_2	β	R^2_1	R^2_2	β	R^2_1	R^2_2
收入水平	高	0.034	0.474	0.476	0.066	0.530	0.539	0.041	0.461	0.464
	低	0.151	0.088	0.118	0.181*	0.188	0.230	0.116	0.150	0.167
外在压力	大	0.141**	0.399	0.437	0.152**	0.358	0.399	0.150**	0.332	0.370
	小	0.152	0.058	0.084	0.080	0.237	0.247	0.098	0.127	0.141
收入渠道	多	0.108	0.044	0.060	0.163	0.122	0.160	0.069	0.064	0.071
	少	0.083	0.375	0.386	0.105*	0.441	0.460	0.133*	0.433	0.462
风险偏好	喜好	0.071	0.193	0.201	0.124*	0.308	0.334	0.076	0.218	0.227
	厌恶	0.228*	0.318	0.393	0.195	0.282	0.336	0.199	0.266	0.319

注: *、**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显著。

表 6 分析可知。(1)对于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收入水平低时,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而收入水平高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收入水平低的农户在拥有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时,会更重视通过提高合作绩效来提高收入,从而也会更重视认知信任的作用。

(2)对于外在压力越大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外在压力大时,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任—服务质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而外在压力小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在外压力小的农户,外在压力大的农户在拥有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时,更具备理性经济人特质,因此更重视认知信任的作用。

(3)对于收入渠道越少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收入渠道少时,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任—服务质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收入渠道多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收入渠道多的农户,收入渠道较少的农户农业生产投入了更多时间与精力,农业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与收入水平低和外在压力大的农户类似,该类农户群体对于合作以及认知信任的依赖性更强。

(4)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存在影响。风险喜好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风险厌恶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因此,无法确定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具体影响作用。可能原因为不同的合作绩效测量指标与农户风险偏好的相关程度不同,农户的风险偏好的形成受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的综合影响,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影响程度更复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具体调节效应,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第二,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促进农户间合作绩效。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对合作社声誉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稳定,很难因土地经营规模更大而对合作绩效产生更强促进作用,但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却能因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而越强。在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经营的趋势下,农户也将更依赖于认知信任。因此,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强化合同管理作用,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农户认知信任,促进农户间合作绩效。

(2)适度扩大部分农户群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经济属性特征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存在影响,且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影响作用明确。虽然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同样存在影响,但本次研究中未能确定其具体影响机制。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造相关政策与法律支持,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参 考 文 献

- [1] 罗必良.农户分工及专业化专题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
- [2] 杨钢桥,靳艳艳,杨俊.农地流转对不同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0(9):118-123.
- [3] 孙亚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6):48-58.
- [4] 徐建春,李长斌,徐之寒,等.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意愿及满意度分析——基于杭州 4 区 387 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土地科

- 学,2014(10):4-11.
- [5] ARROW K J.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M].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74.
- [6] CAMPO J D, PARDO I P, PERLINES F H. Influence factors of trust building in cooperation agreem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67): 710-714.
- [7] 刘宇翔.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9): 64-69.
- [8] AXELROD 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Publishing Companies, 1984.
- [9] 章德宾, 青平, MITCHELL P D. 蔬菜种植户间仍是差序格局下的特殊信任关系吗——某高山反季节蔬菜基地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12): 95-102.
- [10] HANSEN M H, MORROW J L, BATISTA J C. The impact of trust on cooperative membership retention,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J].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2002(5): 41-59.
- [11] 黄珺. 信任与农户合作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8): 45-49.
- [12] 梁巧, 吴闻, 刘敏, 等.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11): 71-79.
- [13] 廖媛红.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社会资本与绩效关系研究[J]. 农村经济, 2011(7): 126-129.
- [14] 赵泉民, 李怡. 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07(8): 40-46.
- [15] 蔡荣, 郭晓东, 马旺林. 合作社社员信任行为实证分析——基于鲁陕两省 672 名苹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10): 69-80.
- [16] 郭红东, 蒋文华. 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5): 10-16.
- [17] KEY N, MCBRIDE W. Production contract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S. hog se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85(1): 121-133.
- [18] JULIU A. The effects of formal education and cooperative membership on the farm size cultivated by farmers in buja, Niger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03, 15(7): 213-224.
- [19] 卢向虎, 吕新业, 秦富. 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 7 省 24 市(县)农户的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1): 26-31.
- [20] 张笑寒. 农户土地入股决策行为及其区域差异——基于江苏省的农户调查[J]. 中国土地科学, 2008(4): 67-72.
- [21] 徐旭初, 周晓丽. 基于社员角度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J]. 商业现代化, 2011(6): 104-105.
- [22] 孙艳华.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生猪行业的调研与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7): 68-75.
- [23] 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及其验证[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4): 11-19.
- [24] 赵佳荣. 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式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2): 119-127.
- [25] 彭莹莹, 苑鹏. 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4(12): 110-115.
- [26] 黄维健, 王惠平, 梁昊. 新时期农民负担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5): 4-8.
- [27] 罗必良, 李玉勤. 农业经营制度: 制度底线、性质辨识与创新空间——基于“农村家庭经营制度研讨会”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1): 8-17.
- [28] 刘双, 祁春节, 赵玉.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2): 23-32.
- [29]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 37(2): 268-274.

(责任编辑:金会平)